

洋务运动史

(修订本)

夏东元 著



像所有事物有它们自己发生发展到衰亡的过程一样，洋务运动也有它的发生发展到结束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各个事件的堆积，而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发展的。因而我们对洋务运动是有规律可循的。洋务运动既有规律可循，那么我们对它的评价，以及洋务运动时期的人物、事件、工厂企业等一切构成洋务运动这一整体的“零件”，都应放在规律中加以评述。

洋务运动史

(修订本)

夏东元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洋务运动史/夏东元著. —修订本.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5617-6745-0

I. 洋… II. 夏… III. 洋务运动 IV. K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88212号

洋务运动史(修订本)

著 者 夏东元
项目编辑 李 雯
文字编辑 潘海林
责任校对 马 晶
装帧设计 高 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印 张 21.25
字 数 488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6745-0/K·309
定 价 48.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修订本前言

中国近代史进程中,1861—1901年的洋务运动即是一场近代化运动。所谓近代化,就是运用新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来装备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发生发展,并与这种发展相适应地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出国,以培养区别于封建士大夫式的新型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并进行有利于新经济发展的政治上的改革,即变封建专制制度为立宪民主制。洋务派头目们,对于发展新型经济和相应地培养新式人才,做得比较好,比较及时,而对于政治上变封建专制为立宪民主制度,则没有也不敢进行改革,这就不可避免地对洋务运动的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

我对洋务运动取得如上所说的认识,是来之不易的。在建国初前十年间,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前80年即旧民主主义时期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乃至戊戌变法和义和团等几个点上,并且似乎热闹非凡。然而占近代史前80年的一半时间的洋务运动,很少有人问津。即使有少数几位“问津”者,对它也只用“两害相权取其轻”一语概括,那就是:清政府洋务派向自认为仅仅是“肢体之患”的英法等侵略者妥协投降,以便取其“长技”,尤其是新式锐利的洋枪洋炮,以将“心腹之害”的太平天国等人民起义迅速镇压下去。这就很自然地把洋务运动定性为封建性、买办性和反动性了。而我恰恰选择了这段长达4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作为研究课题,其中有很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本人所具备的条件。

我在解放区干部学校讲授中国近百年革命史,并以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为重点。这段历史主要是讲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阶级关系、战略策略和路线政策等问题的。一涉及这些问题,就必须了解近代史发生的社会变革,尤其是经济变革,其中也就是发生发展了资本主义。因为有了资本主义经济,才会出现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才会有意识形态上的变化,才有新的文化教育。而所有这些变化,基本上均要追根求源于洋务运动,于此可见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重要了,不研究这段历史,很多重要问题均无法解决。但要研究好这些问题,非有较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为功,其间尤其是经济学理论。而我在这一方面具备着较好的条件。

我在当政治教员时,一方面教中国革命史,同时也讲授政治经济学,而且于1955年刚读完《资本论》三巨册。正在这时或稍后,选择非具备较高经济理论素养不为功的洋务运动作为研究重点,真可谓“天作之合”:我既积累好多问题要到洋务运动中找答案,在学术基础理论素养方面又具备研究这些答案的条件,选洋务运动这个课题作为研究对象和突破口,既可以说顺理成章,也有取得一定成功的可能。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酝酿,读了不少关于洋务运动的资料,初步决定从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民用等工业下手。

1957年春夏之交动笔写《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性质》。正当动笔之时,校园里出现许多据说是“帮助党整风”的黑板报、小字报及至大字报,到6月8日,《人民日报》发

表社论《工人阶级讲话了》，一变而为反击“右派”向党进攻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与黑板报。校园内热闹非凡。我均不为所动，全神贯注于写论文，偶尔撑着阳伞“巡视观光”看看那些大字报黑板报。精力一点没有转移，很快完成了两万二千余字的《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性质》一文。我通看几遍，感到该文虽是自己关于洋务运动的“处女作”，却颇有分量，说理透彻，无懈可击。

此文虽长达二万多字，但只论证一个问题，即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有着资本主义性，因而有进步性。在当时有一种说法：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是封建性、买办性、反动性、毫无资本主义性。这种说法是当时最权威的说法，在学术界也是“一边倒”的说法。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有无资本主义性，所以我的文章做在军用工业“具有资本主义性”上。运用《资本论》给予我的锐利武器，从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等多方面、价值规律等经济规律的作用，论证了近代军用工业无可争辩地有着资本主义性，因而它有进步因素。承认军用工业是否有资本主义性，这关系到民用工业的创办发展，尤其关系到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和历史地位问题。

由于具有资本主义性的近代军用工业发展的需求，加上清政府亟亟于求富，推动了煤炭和五金矿务的开采与冶炼，乃至轮船运输业和电报等工商业的发展，我于是紧接着写了论清政府所办资本主义性的民用工业和民间资本主义的产生等论文，把轮船、电报、矿务、冶炼等均囊括于其中。与此同时或十年“文革”以后，又将我预定研究的人物：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等，从不同角度，写他们对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思想和业绩。不到十年工夫，竟可以出版洋务运动论文集了。发展进度之快可以想见！

1985年，我将有关洋务运动的文章编成《晚清洋务运动研究》一书，交给向我约稿的四川人民出版社。书中文章分三个部分(1)总论性5篇，(2)军用、民用工业和轮船航运4篇，(3)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三位人物6篇。不管哪一部分，基本上均从不同角度论述洋务运动是一场具有进步性的近代化运动。该出版社责任编辑蔡济生同志审稿后，感到大受启发，他对我说了下面的警句：

洋务运动的研究，走进了死胡同，是你夏先生把这个科学研究课题救活的。

我听了在震惊之余，请蔡氏申论其说。蔡说：“在以前学术界一般均说洋务运动是封建性、买办性、反动性，并且说近代军用工业毫无资本主义性。这还有什么可研究的呢！这不是把洋务运动研究拖进了死胡同了吗！你夏先生从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下手，主要论证该工业企业有资本主义性，因而它有进步因素，推论下去洋务运动即是近代化运动。这对研究者来说不是大有可为了吗！这不是把‘拖进死胡同’的洋务运动的研究‘救活了吗！’”我赞同蔡同志的说法，并告以：洋务运动史可研究的课题多得很，不少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哩！

夏东元

2007年7月1日

前 言

《洋务运动史》的酝酿、发展、变化过程^①是曲折的，单提纲就五易其稿。196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约我写一本《洋务运动》作为青年的读物。我那时正在写“李鸿章传”，因此书与我写“李传”可以结合，故答应了，约写8万字，于1963年冬交稿。这时正是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气氛中，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开展之际，这种书的出版当然不会被提上日程（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我将该稿索回，该出版社要我修改寄去，我未应）。书虽未能出版，却启发了我写20万字洋务运动史的动机。我在该书交稿后即拟了一个分为10章的洋务运动史写作提纲。“文革”后上海人民出版社与我议定写一本较大型的洋务运动史，于是在1963年提纲的基础上拟定了新的写作提纲，并按题积累资料。1981年应人民出版社之约，拟订共为28章连“导言”29个单元，打算写50—60万字的《洋务运动史》。1983—1984年间即着手写作，但在写作中，到处遇到总揽洋务工业企业大权的盛宣怀其人，感到如不比较深入地研究盛宣怀，而要把洋务运动史写好，是不可思议的。于是将本拟置于洋务运动史之后写作的《盛宣怀传》提到了前面，洋务运动史则暂时搁下。1987年《盛宣怀传》完稿并很快于1988年出版，乃着手写《洋务运动史》。这时又出现另一种想法，即打算将此书写成逻辑发展史，改书名为“洋务运动兴衰成败”，并拟订了12个单元的提纲。以之征诸有关同行，一般均认为还是写成《洋务运动史》为好，因为它既有系统的知识，又能突出我的研究体系；既是学术专著，又可作为教材，对于读者尤其是青年们帮助更大些；如果改写为逻辑史，势将突出理论而减弱知识性。于是基本上仍按1981年分为28章的那个提纲加以修订，改为19章，即现在本书中的章节。

本书从第一个提纲开始到完稿，经历了27年，写作上困难是很多的。所幸有我历届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帮助。他们或收集材料或草拟某些章节，对于我的写作起了不少作用。他们中主要有：于醒民、杨晓敏、黄继宗、赵晓雷、汪智和、姜进、陈彪、吴福环、夏冬、聂资鲁、易惠莉、沈毅等同志。其中帮助草拟者有：聂资鲁、张能政草拟第二章第三、四节，于醒民草拟第三章相当一部分内容，杨晓敏草拟第四、五、六三章中某些部分，吴福环草拟第十一章中的“开平煤矿”，赵晓雷草拟第十二章中的“汉阳铁厂”，张能政草拟第十四章中的二、三、四节。这对他们的学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同时也助了我一臂之力，我对他们表示谢意。

我的夫人薄芳同志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抄写了许多关于洋务运动资料卡片供我

^① 关于我的洋务运动史研究体系及其形成过程，请看本书“附录一”《我和洋务运动史研究》。

2 洋务运动史(修订本)

在写作中运用,本书中不少附表均出于她之手,此外还作了核对资料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集中了我 30 余年来有关洋务运动的研究成果。对于学术界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吸取则很欠全面,望同行们谅解。

夏东元

1990 年 11 月于华东师范大学寓所

2007 年 6 月 16 日修订

目 录

修订本前言 / 1

前言 / 1

洋务运动发展论(代序) / 1

- 一、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 1
- 二、洋务运动发展过程中内容和客观作用的变化 / 5
- 三、对“体”的自我破坏和三论洋务派
——洋务运动即近代化运动 / 9

第一章 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历史趋势 / 13

- 一、为什么从“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谈起 / 13
- 二、社会经济由制约于封建主义到制约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质的转变 / 14
- 三、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的变革思潮 / 17
- 四、经济规律与变革思潮的汇流——学习西学 / 21

第二章 适逢经济和思潮变革之会的洋务运动的兴起 / 26

- 一、“两害取轻”的抉择 / 26
- 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 / 29
- 三、坚船利炮的购求 / 33
- 四、推动洋务运动全面展开的“练军” / 36

第三章 “借师助剿”及其对洋务运动兴起的作用 / 40

- 一、“借师助剿”的正义 / 40
- 二、“借师助剿”的历史溯源 / 41
- 三、上海势力促使清廷对“借师助剿”的默许 / 43
- 四、形势骤变和“借师助剿”公开化 / 48

第四章 近代军用工业之一

——从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制造局 / 52

- 一、中国近代军用工业的开端——安庆内军械所 / 52
- 二、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制造局的过渡
——上海、苏州洋炮局 / 55
- 三、“制器之器”的江南制造局创办 / 57
- 四、江南制造局的建制结构与产品
——中国近代机器制造工业的先驱 / 60
- 五、江南制造局的资本主义性与民族性 / 64

第五章 近代军用工业之二

——马尾船政局 / 69

- 一、建造轮船工厂的历史必然 / 69
- 二、在与内外阻力斗争中创业 / 71
- 三、建造轮船工厂及“衍于无穷”的追求 / 74
- 四、马尾船政局的生产和发展状况 / 76
- 五、突出人才的重要性及其作用 / 81
- 六、船政局发展中的矛盾 / 82

第六章 近代军用工业之三

——金陵、天津及各省机器局 / 84

- 一、金陵、天津及各省机器局的创办目的及其概况 / 84
- 二、金陵机器制造局 / 85
- 三、天津机器制造局 / 89
- 四、山东机器局 / 92
- 五、兰州机器制造局 / 98
- 六、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与作用 / 99

第七章 洋务文化教育的开端 / 103

- 一、举办洋务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 / 103
- 二、京师同文馆开馆和广方言馆的创办 / 105
- 三、京师同文馆招收正途官员学科学及其革新与守旧的论争 / 107
- 四、各主要同文馆发展简况 / 111
- 五、求是堂艺局的创办及其发展 / 118

第八章 洋务路线的改善及战略性转变 / 122

- 一、列强从加强经济侵略到新的武装入侵 / 122
- 二、由求强到求富的思想转变 / 123
- 三、由“制内”到御外侮的战略性转变和对海军海防建设的强调 / 126
- 四、洋务派集团的新构成 / 129

第九章 由求强到求富的过渡——轮船招商局 / 131

- 一、创办轮船航运局的目的和“公局”成立 / 131
- 二、官督商办名义下的商办 / 133
- 三、名符其实的“官督商办” / 137
- 四、艰苦竞争与三订“齐价合同” / 140

第十章 电线电报业的创办与发展 / 145

- 一、适应了时势的需要 / 145
- 二、抵制列强的侵权和经营电报的思想 / 147
- 三、官商两利但以“利商”为本的原则 / 151

四、中国电报局对列强侵权的抵制和斗争 / 154

五、电报的社会作用 / 158

第十一章 采煤工业的兴办和发展 / 160

一、资本主义掠夺中国煤矿的企图 / 160

二、针对列强侵权的决策 / 163

三、从磁州转向开平的煤矿开采 / 165

四、基隆煤矿 / 170

五、从广济到荆门的煤矿开采及其失败 / 172

第十二章 金属矿的开采与冶炼 / 176

一、开采金属矿的目的及其简况 / 176

二、云南铜矿与平泉铜矿、淄川铅矿 / 180

三、漠河金矿 / 183

四、青谿铁厂 / 185

五、汉阳铁厂 / 187

六、矿业的成败关键 / 192

第十三章 近代海军的筹建 / 193

一、水师的历史溯源 / 193

二、以御外侮为目的筹建海军
——“防东洋尤甚于防西洋” / 197

三、海军建设与北洋舰队 / 201

四、海军建设中的诸矛盾 / 208

第十四章 海防与新式陆军 / 212

一、海口陆上防务 / 212

二、练军的发展 / 217

三、自强军 / 221

四、新建陆军 / 226

五、新式陆军的历史作用 / 227

第十五章 铁路的筹建 / 230

一、对列强觊觎铁路修建权的抵拒 / 230

二、自办铁路的认识和尝试 / 233

三、19世纪80年代前、中期两次论战与唐胥、津沽铁路建成 / 237

四、第三次大论战及洋务派内部的争论 / 241

第十六章 纺织工业 / 246

一、办纺织工业的指导思想 / 246

二、兰州织呢局 / 247

三、上海机器织布局 / 250

四、华盛纺织总厂 / 254

五、湖北纺织官局 / 257

第十七章 洋务教育的发展 / 261

一、由封建教育逐渐向资产阶级教育转变 / 261

二、派幼童赴美国留学 / 262

三、留欧学生的派遣 / 266

四、各类实业学堂的设立 / 271

五、具有实学性质的水陆师学堂和西医院的设立 / 274

第十八章 洋务运动与各方面的关系

——兼论有关洋务运动一些理论问题 / 279

一、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的关系 / 279

二、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 / 281

三、洋务运动与洋务派和某些洋务人物的关系 / 283

四、洋务运动与外交的关系兼论李鸿章办洋务和外交的矛盾 / 286

五、洋务运动与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关系 / 288

六、洋务运动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关系 / 291

第十九章 洋务复兴运动与尾声 / 293

一、成功与失败 / 293

二、洋务的继续举办与发展 / 295

——洋务复兴高潮

三、洋务派与维新派的交叉、交替与异同 / 300

四、对“中体西用”洋务理论的突破倾向

——论张之洞《劝学篇》和“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 303

附录一：我和洋务运动史研究 / 309

附录二：为洋务运动正名的第一人(包汉中) / 321

附录三：夏东元著《洋务运动史》(节录)(吕实强) / 325

后记 / 326

再版后记 / 327

洋务运动发展论* (代序)

像所有事物有它们自己发生发展到衰亡的过程一样,洋务运动也有它的发生发展到结束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各个事件的堆积,而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发展的。因而我们对洋务运动是有规律可循的。洋务运动既有规律可循,那么我们对它的评价,以及洋务运动时期的人物、事件、工厂企业等一切构成洋务运动这一整体的“零件”,都应放在规律中来加以评述。

一、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一提起洋务运动,人们总是很自然地想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公式。确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词,虽到19世纪90年代才为人们所提出^①,但早于此几十年前,“中体西用”的思想不仅已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也是洋务派的基本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发端,还可以追溯到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魏源等人。他们在鸦片战争中所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实际上就是“中体西用”的思想雏型。为什么?因为从根本上说,所谓“中学为体”,就是清王朝为首的封建主义统治秩序为体,所谓“西学为用”,就是学习和运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维护这个“体”。因此,具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人,就是站在清王朝为首的地主阶级立场上,用新的有效的手段,即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来保卫封建统治这个“体”。哪一种力量——外来侵略或人民革命——对这个“体”的威胁最大,具有这一思想体系的人就要用这新的手段对付谁。在中国近代史上首先是对付谁的呢?答复是,首先是对付对于清朝统治威胁最大的外国侵略者的。其标志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的提出,也就是说用西方“长技”来“制夷”以维护这个“体”。

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长期闭关自守实行封闭式的统治,对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无所知,妄自尊大地认为天朝是最完美无缺的。鸦片战争中的枪炮声,惊醒了统治者中敢于面对现实的人。他们发现洋人的火炮威力很大,不是原始的弓箭刀矛所能抵敌的。林则徐从实践中认识到中西在军事技术上的差距,他带总结地说:

* 这是一篇论文,写于1979年,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三期。

①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词,较早见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万国公报》中《教时策》一文。此文系沈毓桂以“南溪赘叟”署名发表。文中写道:“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口(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讲“中体西用”一语,则始见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五日所上《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章程片》中,原文是:“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国(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机,亦杜离经叛道之弊。”见《张文襄公全集》(以下各篇均简称《张集·奏议》)第47卷,第22页。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展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林则徐在认识到中西火炮差距的基础上，并总结出战胜敌人的“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八字要言”^①，而把“器良”置于首要地位。因此他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②。他认为如能制造和使用“与外洋相同”的大炮，“则不患无以制敌”。

魏源对问题的看法要比林则徐高明。他不但在中西武器差距上有与林则徐类似的认识，而明确的要“以彼长技御彼长技”^③，并且在如何学习和运用西洋长技上作了较为深刻的阐述，并提出具体的方案、措施。他要求创设近代军事工厂不仅是制造战舰等新式武器，而且要做到一切“有益民用”的机器和新式生产工具，“皆可于此造之”；不仅国家投资设立工厂制造这些机器设备，而且鼓励“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者来投资创办，制造出来的工具，“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④。这些表明魏源已有用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远远超越林则徐单纯在军事技术上学习西方长技的思想。从实质说，魏源除要“师夷长技”以在战场上战胜外国侵略者外，并有了在商品市场上与外国资本主义相角逐的思想。

由此可见，清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要改变旧的落后的军用武器，采用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是由于清朝的统治和天朝的尊严遇到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威胁，作为清统治支柱的军队受到西方新式武器沉重的打击。因此，在鸦片战争时“中体西用”思想所表现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变革”和“御侮”四个字。即变落后为先进，以有效地抵御外侮，出发点是为了维护清封建专制统治这个“体”。这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方针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就是中国近代所特有的洋务思想的开端。这个开端显然是个进步。

若干年来，学术界一提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很少不以反动二字加之。果然如此吗？它发端于鸦片战争中，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要变落后为先进以御外侮，这不是有进步的积极的一面吗？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思想体系的起源及其性质与作用的问题弄清楚，可以论述一下“洋务”二字的概念了。洋务(原来叫“夷务”)本来是指清政府与外国打交道的一切事务。鸦片战争以后，逐渐变为以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中心的包括外交、贸易的一些事务，通称为“洋务”。在鸦片战争中若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中心内容办洋务，那么办洋务就是大好事，而不是坏事，是褒词而不是贬词。所以魏源称学习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洋务事业为“受益”之举，他说：“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⑤然而，顽固派颠倒是非，视学习西方长技为大坏事，把“受益”说成是“受害”。直至洋务运动时期，对“洋务”的观感仍然基本上是先进与顽固的是非界线。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就把

① 以上引文均见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书》，《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2集，第2卷。

② 见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师敌之长技以制敌”一语，是魏源对林则徐《密陈夷务不能歌手片》中心思想的概括。

③ 魏源《军政篇》，见《圣武记》第14卷。

④ 魏源《筹海篇三》，《海国图志》第2卷。

⑤ 同上。

办洋务比为“君父之有危疾”而“百计求医”的行为；谴责那些“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的所谓“正人者”，为“痛诋医之不可恃……而坐视其死亡”^①的奸臣逆子。由于鸦片战争时闭关自守的顽固派掌握着国家权力，把要变落后为先进的“师夷长技”的代表人物林则徐革职，谪贬伊犁。清朝的顽固派打算照老样子统治下去。有先进思想的人们再也不敢谈以“师夷长技”为中心内容的洋务了。

可是，历史不是如顽固统治者想象的那样发展。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并形成全国规模的运动，清朝统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先后侵略进来了，不仅清王朝受到侵略者的威胁，整个中华民族也遭殃了。这时，一些有心人，担心国家民族的危殆，认为非变不足以挽救国家民族于垂危之中。于是，1860年前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变革的思潮。1859年洪仁玕的《资政新篇》；1860年前后容闳向太平天国建议的七条纲领，和他向曾国藩所提发展近代工业的献策；1861年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以及王韬在这时期一些学习西学等有维新倾向的言论，都表明了这种变革思潮的形成。这些思想家们的立场、出发点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尽一致，但他们都要求“变”则是相同的。前二人不一定有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后二人则有比较明显的“中体西用”思想的，而尤以冯桂芬为最鲜明。他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②这是中国近代最早明确表述“中体西用”观点的一个人。《校邠庐抗议》是贯串着这一观点的有理论体系的一部书。如果说冯桂芬是“中体西用”思想的理论家，那么，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则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当然，冯桂芬的理论与奕、曾等人的实践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从《校邠庐抗议》全书看，冯桂芬要用西学为手段来维护封建统治这个“体”的思想，是既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又要师夷之长技以制人民。即他为了保卫清朝的统治，要用西学为手段，既战胜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又要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这是1856年至1860年间，太平天国革命蓬勃发展和英法联军侵略，使国内阶级矛盾和外部民族矛盾都很尖锐，而同时想解除两种敌对力量威胁之时出现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事实上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对清政府来说，是没有一种力量同时战胜两大敌人的。哪一种敌对力量是致清王朝死命的力量呢？统治者认识到是太平天国和其他人民起义的力量。“两害相权取其轻”。清政府采取了对外国侵略“和好”并依靠其先进军事技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达到维护清王朝为首的地主阶级统治的方针。于是，清政府在与英、法、美、俄等国签订屈辱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之余，开始了购买洋枪洋炮，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为中心内容的洋务运动。

由此可见，洋务运动是鸦片战争中林则徐、魏源等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直接继承和运用，也是顺应1860年前后变革思潮的一个表现。洋务派把地主阶级改革派纸面上的议论付诸实践了。

叙述到这里，可能有人要说，林则徐、魏源与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师夷长技”这一点上虽然一致，但前者是“制夷”，后者则是“降夷”以制人民，性质有别，何以说有继承关系？我认为，林、魏与奕、曾、李等人不仅在“师夷长技”上相同，阶级立场也是基本一致

① 引文均见郑观应《西学》，《盛世危言》第1卷。

② 冯桂芬《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第2卷。

的,即都要维护清王朝为首的地主阶级统治。这样的阶级立场,在外国侵略震撼清政府统治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师夷长技以制夷者,但在另一历史条件下,即人民起义震撼清政府统治的时候,就有可能是一个师夷长技以制人民者。地主阶级改革派处在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两对矛盾都很尖锐的情况下,“两害取轻”地从一个师夷长技以制夷者转变为师夷长技以制人民者,不仅是可能,而且还有其逻辑必然性。冯桂芬就是从地主阶级改革派转变为洋务派代表人物的。这种现象,我曾称之为“一个思想体系两种政治表现”^①,即一个“中体西用”思想体系,在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情况下的不同政治态度。具体说就是,当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对清统治威胁最严重的时候,有这种思想体系的人,则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一旦外国侵略与人民起义力量都成为清王朝严重威胁时,则既师夷长技以制夷,又师夷长技以制人民,当二者不可得兼时,他们会舍去“肢体之患”的外国侵略者,而集中力量对付人民起义这一“心腹之害”。

问题在于,当人民起义被镇压之后,社会主要矛盾即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突出出来,这些师夷长技以制人民的洋务派,是否有可能再变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者呢?答复是肯定的。如果其中多数人不能作这样的转变,那就是不合逻辑了。这,不仅在理论说得通,在实际生活中也确实存在。

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各地人民和少数民族起义到1874年也相继被镇压下去。正在这时,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地区,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东南海防与西北塞防同时告警。接着英、法等国也纷至沓来,侵犯西南等边境地区。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对清政府统治来说,威胁它的主要不是国内人民起义而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了。在这种情况下,具有“中体西用”思想的洋务派,除极少数死心塌地的民族败类外,必然要从师夷长技以制人民,变而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历史确是如此。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洋务派中的抵抗派也随之不断地涌现。这种情况,固然可以从摧毁英、俄走狗阿古柏政权,和从沙俄手中收复伊犁的左宗棠身上得到典型的说明,也可从张之洞、曾纪泽、刘铭传、丁汝昌等人的抵抗主张和行动中得到证实。当然,社会现象是复杂的,前进与后退,进步与落后,抵抗与妥协,光明与黑暗等等同时存在,一个历史人物的言行也往往有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在大堆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找到各种不同的你所需要的论据。我所举的上面这些抵抗派人物,你也可以找到他们妥协一面的资料。但不能否认,他们的总倾向是抵抗外来侵略。

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以“中体西用”思想作指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仅表现在军事上由对内镇压人民,转而对外抵御外侮,尤其表现在经济上抵制侵略,即大力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以在市场上“制夷”。所以这时的取洋人长技,不同于前一时期的仅仅是军事技术上的东西,而是除军事技术之外,更多的注重于一般民用机器技术和广泛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引进与学习。因此,可以说洋务运动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了一个大转变。

根据上面对洋务运动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分析,可以初步看出洋务运动是怎样性质的运动了,那就是:以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和拯救清王朝为首的封建统治的活动。既然它的目的是拯救清封建统治,因此当人民革命力量危害其

^① 夏东元《再论洋务派》,发表于《文汇报》1979年2月9日。

统治时,就取洋人长技以镇压革命,洋务运动一开始就是如此,当外国侵略成为其统治的主要危害时,就取洋人长技以“制夷”,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情况就是如此。目的虽是一个,表现却大不一样。

二、洋务运动发展过程中内容和客观作用的变化

“目的虽是一个,表现却大不一样”,这表达了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里所讲的“大不一样”的“表现”,主要是说洋务运动的内容和作用的变化。

19世纪70年代以后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具有自己的时代特点的。在军事措施上,不同于19世纪60年代以镇压人民革命为目的的一般学习使用洋枪洋炮,却有与鸦片战争时期重视海军的建设以御外侮的方针相同,在办工厂企业的经济措施方面,不同于19世纪60年代以办军用工业为主的制造业,却有与魏源的除办军事工业外着重发展民用工业企业的论述有相似之处。其原因很明显,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相同,集中力量对外有其一致性。

首先具体叙述海军海防的建设。清政府新式水师的创建不是自19世纪70年代始,但重点抓新式海军的筹建,却发起于1874年。这是为什么?这是由于那年日本派军队侵略台湾而引起的。清政府意识到:“日本兵踞台湾番社之事,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①他们认为“日本东洋一小国耳,……竟敢藉端发难”^②,这是不能容忍的,所以非大力筹建海军海防不可。尽管李鸿章在建军之初即说过海军建好后,要到“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③的妥协性言论,但不能否认,创建海军的目的是为了御外侮。陆军也在加强更新装备,并新建带有国防军性质的“练军”。不能设想,没有这些新建的海军海防和陆军装备的新建与改善,能有在中法战争中取得如1885年台湾海峡和台湾的抗法斗争和镇南关大捷的胜利吗?有1894年黄海海面将士们的抗日战斗吗?不错,中法、中日战争,或以清政府不败而败,或以失败而结局,这主要是由于清政府的腐朽造成的,不能说清政府建立海军海防不是对外而是为了对内镇压人民革命;更不能说创建海军海防仿佛是为了更有效地投降而不是为了抵抗外敌。在过去,论者往往把洋务派所经营的海军海防说得一无是处,抛开抵抗胜利的一面不谈,或一笔带过,而着重选择阴暗、腐朽、失败、妥协等方面的材料加以渲染。这些渲染,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不错,阴暗、腐朽、失败、妥协等都是有的,但这是统治者在一定条件下阶级本性的表现,不单是洋务官僚所独具。

洋务运动由对内转而对外,不仅表现在军事上的海军海防的创建上,尤其鲜明地表现在经济方面大办民用工业企业以抵制侵略上。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以办军用工业为主的话,19世纪70年代则以办民用工业企业为主,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变革思潮表现为取洋人长技以镇压人民革命的话,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变革思潮则表现为兴

① 总理衙门奏,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98卷,第19页。

② 文祥奏,同治十三年十月十八日,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98卷,第41页。

③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卷,第12页。

办民用工业企业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

洋务派之所以要在 19 世纪 70 年代前期,开始致力于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根本原因是为了求富。他们当“海防议起”时,发觉没有大量经费是办不成功的。但“军兴以来凡有可设法生财之处,历经搜刮无遗。商困民穷,势已岌岌。”^①他们认为,英、法等国之所以强,是由于它的富,富又系来自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强与富相因”,成了他们的一般认识,洋务派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濬饷源,莫如振兴商务。”^②于是,洋务运动成为“富强相因”的运动。

当洋务运动从求强转变为求富并以求富来求强的时候,正是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急剧加强的时候。洋务派的求富目的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发生了直接的冲突。

自 1858 年《天津条约》、1860 年《北京条约》签订后,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暂时停止或缓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特别是在经济侵略方面大大加强。外国的商品输入激增了:在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每年中外贸易额不过一千万至三、四千万海关两之间,1864 年则达到一亿零五百万海关两。而这种增长趋势正在发展着。问题还不在于贸易额的增长,而在于:一、中国由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出超变为 19 世纪 60 年代的人超;二、商品进口结构起着不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变化影响:即与广大人民生活最切近的商品如棉纺织品的输入增长很快。这样,输入的货物愈多,漏卮愈大,对国民经济的损害也愈重。于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出现了发展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挽回利权的思潮。一些有心人呼吁:中国应赶快发展近代工业,使“凡中国所需于外国者,即可自行制造;外国所需于中国者,并可自行贩运。收回利权,扩我远图”。这样做去,“将使洋人进口日见其衰,华人出洋日征其盛。富国裕民之效,可操券而得焉”。人们还呼吁:不仅要用机器生产价廉物美的商品进行抵制,还必须发展近代航运业以进行抵制。他们说:“洋船往来长江,实获厚利,喧宾夺主,害不独商”。而提出“凡西人长江轮船一概给价收回”^③的主张,以发展近代航运业与外国航运业相竞争。连李鸿章也说,办轮船招商局“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④，“不致为洋人占尽”，也就是所谓“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⑤。

由此可见,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洋务派的经济活动重点转向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是服从于他们的求富要求的,同时也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急剧加强与“求富要求”相冲突而引起抵制的。二者是有区别的但又是联系着的。这就是说,求富就必然“分洋商之利”。历史的事实证明,他们确实做到了“略分洋商之利”,使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兹以 1873 年以后所举办的轮船招商局^⑥和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例来说明。

首先以轮船招商局开办头若干年的赢利情况看。

① 李鸿章《论海防筹饷》，《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 3 卷，第 18 页。

② 李鸿章《议复梅启照条陈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 39 卷，第 32 页。

③ 以上引文均见郑观应《商务》，《易言》20 篇本第 24 页。

④ 李鸿章《试办招商轮船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 20 卷，第 33 页。

⑤ 李鸿章《议复梅启照条陈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 39 卷，第 32 页。

⑥ 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局在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即 1873 年 1 月 14 日，所以不宜说是 1872 年开办轮船招商局，而应说是 1873 年。